

海外视野

海斯伯格给今人的启示有三:首先,大学校长要能够为所在学校提供教育和智慧上的领导;其次,大学校长要有坚定的立场,要敢于言说;最后,大学校长应该是有远见和有公共服务精神的领袖人物。

百岁大学校长的传奇人生

郭英剑

2月26日,美国著名高等学府圣母大学沉痛宣告,该校97岁高龄的老校长海斯伯格不幸去世。

这几天,圣母大学网站一直以全黑的背景来表达哀悼之情,除了中央右侧一幅老校长的照片,左侧为他的一段引言和两个链接之外,别无其他内容。根据安排,该校在美国时间3月3日和4日两天,为老校长举办了隆重的葬礼,同时开展了众多悼念和怀念活动。

《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今日美国》、CBS、CNN等美国主流媒体都对此予以报道。美国时间3月2日,圣母大学宣布,美国前总统卡特及其夫人、前国务卿赖斯将前来参加老校长的葬礼,并发表演讲。包括现任参议员在内的许多政要以及普林斯顿大学前校长在内的高等教育界名流也都将参加葬礼并发表演讲。圣母大学所在的印第安纳州州长宣布,3月3日这一天,全州所有旗帜下半旗,悼念这位为美国高等教育和社会作出了突出贡献的百岁老人。

35年:黄金时代的伟大校长

圣母大学信仰天主教,是一所世界知名、美国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在最新的2014~2015《美国新闻与世界周刊》的大学排名中,位居全国性大学第16名。

海斯伯格原名西奥多·马丁·海斯伯格,出生于1917年5月25日。他从小立志成为一名牧师,曾经在圣母大学学习过,但后来被派往意大利,1939年在意大利获得本科学位。但他在罗马学习期间,又因为二战爆发而不得不离开。1945年,他毕业于美国天主教大学,获得了神学理论博士学位。毕业之后,海斯伯格到圣母大学任教。3年之后,1948年,他被任命



图片来源:www.nd.edu

为该校的常务副校长。又一个3年过去了,1952年,在海斯伯格年仅35岁时,成为了这所大学的第15位掌门人。到1987年,海斯伯格在圣母大学校长的位置上,一干就是35年。

在海斯伯格的领导之下,圣母大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该校所罗列的一组数据,或许可以说明问题。这组数据的对比是:1952年海斯伯格担任校长时和他1987年卸任校长时,圣母大学所发生的变化。

学校的年度预算由970万美元增长到1.766亿美元;捐赠基金由900万美元上升到3.5亿美元;研究项目基金由73.5万美元增至1500万美元;学生的入学人数、教师人数和学位授予数都翻了一番,学生由4979人到9600人,教师由389人到950人,授予学位人数由1212人到2500人。

海斯伯格带给学校最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将学校的管理权,由过去完全的教会管理,拓展到由教会与非教会两方面的人士组成;第二,将这所从一开始成立就仅仅是男校,发展到在1972年开始招收女生。而截至2013年,该校的女生人数已经占到48%。

由于为高等教育所作的突出贡献,海斯伯格成为了美国教育界的传奇人物。在他的一生当中,曾经获得过多达150个荣誉学位,在这个世界上,无人能出其右。1964年,他获得总统自由勋章。2000年,作为首个高等教育界的代表,他获得了国会颁发的金质奖章。

在美国,1945年至1970年被学术界称为“大学的黄金时代”。而海斯伯格从1948年开始担任常务副校长,其长达39年之久的大学校长生涯,恰好处于大学的黄金时代。海斯伯格自然成为了黄金时代一位伟大的校长。

创造服务社会的辉煌成就

海斯伯格的贡献与影响力,并不仅仅限于高等教育内部,而是波及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文化等等领域。如果我们来看一下他所担任的社会职务,就能大致看出他为美国社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他曾16次在由美国总统任命的委员会中

任职。这些委员会的使命与职责涉及人权、核能的和平利用、校园安全稳定以及移民改革等。

作为首位牧师,他曾入选哈佛大学校监委员会,并担任过两年的哈佛校监会主席。

在担任美国和平研究院董事期间,他曾帮助组织了一个由包括科学家在内的各方代表参加的呼吁消灭核武器的论坛。

他曾担任洛克菲勒基金会董事会主席,还曾担任1979年联合国科技发展大会的大使。

即便是担任众多的社会职务,但海斯伯格还是以服务高等教育为主,成为全美高等教育的领军人物。1958年,他曾经撰写美国教育制度的评论——《追求卓越》。这对后来的美国高等教育产生了较大影响。从1963年到1970年,他一直担任天主教大学国际联盟的主席,领导了一场重新认识并反省教会大学本质与使命的运动,主导了美国当代教会大学的转型。

即使在海斯伯格卸任圣母大学校长职务之后,还一直担任该校的名誉校长,也继续在高等教育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另外,1990年到2003年,他还担任美国大学田径委员会的联合主席,为推动大学体育运动的改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当代大学校长何为

在今天,当人们缅怀海斯伯格时,一个突出的问题体现在,在当代社会,大学校长何为?在我看来,海斯伯格给今人的启示有三:

首先,大学校长要能够为所在学校提供教育和智慧上的领导。正是在海斯伯格的领导下,不仅圣母大学的管理层进入了非宗教人士,而且他还领导国际天主教大学进行了改革。而这一点,在当时为世所罕见,曾在大学内外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和担忧,甚至有人指责他交出了大学的管理权。但他认为,这样做有利于大学的进一步发展。从此之后,美国每一所教会大学都有了非教会人员组成的董事会。也是在海斯伯格的领导下,圣母大学从一所男校变成了一所男女合校的大学,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像这样改变大学风貌的措施,无疑是对大学校长的智慧与领袖才能的巨大考验。

其次,大学校长要有坚定的立场,要敢于

言说。特别是在高等教育领域方面,要具有领导学术界未来走向的勇气和魄力。作为天主教大学共同体公认的领袖,海斯伯格一直拒绝天主教会对大学施加更多更大的影响力,从而尽最大可能保障了大学和学术的自由。虽然海斯伯格曾为六任美国总统服务过,但他从来都没有仅仅是听命于白宫的指令。从1957年起,他就开始担任美国人权委员会的委员,从1969年开始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但到了1972年,他却因为经常反对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而被尼克松免去了主席职务。他也曾经坚决反对越南战争,要求美国从越南撤军。到了2009年,当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应邀到圣母大学演讲遭到很多人反对的时候,海斯伯格则站出来支持这一邀请,并亲自参加了奥巴马的演讲会。这样的立场与言说,无疑需要直面现实的勇气和担当。

最后,大学校长应该是有远见和有公共服务精神的领袖人物。虽然在社会上有人坚持认为大学校长的言论应该限制在高等教育范围之内,但也有更多的人对此持反对的态度。像巴尔的摩的古彻学院的校长恩格就坚持认为,任何话题都可以谈,而且要大胆发言,强调“理性的、冷静的辩论”,这正是学术界领导人所具备的独有特征。况且,很多社会问题其中都透露出与教育问题的密切关联。比如“全球变暖”的问题,在恩格看来,其实就是科学与愚昧都关注的问题。如果大学校长不敢站在科学一边反对愚昧,那实在是令人悲哀。

对此,海斯伯格在2001年《美国高等教育纪事》上发表文章有更深刻的论述。他问道,在当今重大的公共议题上,大学校长的声音在哪里?他认为,大学校长不应只精心浇灌自己的“小花园”。如果想培养未来世界的富有勇气和智慧、敢于言说的一代人,首先要自己做得好。这样的文章,即便是在今天看来,也同样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据《纽约时报》报道,1986年,在海斯伯格退休离任的时候举行了一项调查,被调查的全美485所大学校长,一致推荐他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大学校长。这并非虚言,但却说明了在众多大学校长的心目中,海斯伯格无疑是当代大学校长的杰出代表。

记者快评

美国的春节和中国的圣诞

陈彬

如果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元宵节就是每年春节的最后一天。也就是说,过完了3月5日,2015年的春节就将正式离我们而去。

然而,关于春节,可以聊的话题却并没有减少。

比如,今年春节,远在千里万里之外的美国高校过得热热闹闹,除了大芝加哥地区的九所高校联合举办春节晚会,更有纽约州华裔参议员孟昭文递交提案,欲将春节定为美国法定假日,这份提案已经获得了美国会参议院的支持。事实上,就在去年5月,纽约州已经先行将春节列为了该州学校的法定假日。

此外,美国白宫也对公众提出的“将中国春节列为美国法定节日”的请愿作出了回应。

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日益密切,春节似乎在美国变得更加为人所接受。而在中国,我们面对“洋节”又如何呢?

去年的12月24日,正值西方传统节日圣诞节前的平安夜。西安某学院将全体学生强制组织到教堂,集体观看有关中华传统文化的宣传片。该学院表示,谁过圣诞节就处分谁。此举引起了一片质疑之声。

除了西安高校外,在去年圣诞节期间,湖南、江西等省也有部分高校对学生过圣诞节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而他们给出的原因,基本都是“圣诞节属于西方文化,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抵御西方文化扩张”。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让人很“无语”的理由。

在高校如何看待外来节日的问题上,其实反映的是高校本身对于人才培养定位的认识。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倡导“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这种国际视野中,对于外来文化的理智接纳和认识,无疑占据了重要部分。但当以圣诞节为代表的西方传统文化来袭时,高校所采取的这种“抵制”姿态,无疑是让学生收起来已张开的双臂,采取“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根本就不应是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所该有的。

事实上,那些在平安夜聚会聚餐,在圣诞节高呼“Merry Christmas”的莘莘学子,在每年春节时,依然会千里迢迢赶回家中,和家人一起包饺子、放鞭炮、相互拜年。在他们心中,洋节只是娱乐,春节才是内心真正的挂念。

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些为了一个“娱乐事件”而兴师动众的高校,不仅有些“小家子气”,更反映了其对学生民族认同感的一种不信任以及对自身传统文化教育的不自信。

在这方面,西方学校的做法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面对外来文化,如何宽容地接纳它,理智地认识它,乃至合理地“利用”它,将其变成与世界文化相互沟通的渠道,这值得高校认真想一想。

域外传真

别被科学界缩小的性别鸿沟迷惑

柯特·莱斯

职业发展经常被描述为一个发展管道。在许多领域,如法律、电影、商业、新闻和学术界等,管道会发生“泄露”现象。最重要的是,它泄露了女性。随着我们通往更高的职业道路,人们通常发现,男性比例上升,女性比例下降。

一组来自欧盟的数据描述了目前学术界的趋势。在2010年,59%的本科学位获得者是女性,46%的博士毕业生是女性。而在大学的职位中,44%的入门级职位由女性担任,而高一级的职位中,女性比例下降到37%。当我们统计全职教授的时候发现,只有20%是女性。在科学和工程领域,统计数字更为糟糕:女性在博士毕业生中占35%,入门级职位占32%,中间等级的23%,只有11%的全职教授。

不过,根据发表在《前沿心理学》上对美国学生的研究,这种招聘趋势可能会改变。传统职业发展阶段节点上不同的百分比,为女性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快照。这项新研究像是一部延时电影,浓缩了30年间的研究趋势。

研究者们所调查的学生,都是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等领域获得学士学位的本科生。然后,学者研究了这些学生继续完成博士学位的百分比——他们称之为“持久率”的部分。他们发现,历史上男性比女性有更高的持久率,更高比例的人攻读了博士学位。不过,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还有其他的发现——男性和女性的持久率在相同比例上发展。乍一看,这似

乎是个天大的好消息。不幸的是,这项新研究实际上并没有显示发展管道的泄露,收紧——它显示了相反的结果。男性与女性的持久率趋同不是因为女性继续发展的上升,而是由于男性继续发展的速度下降。这一速率目前为3%。这是值得庆祝的事情吗?我不能想象为什么。论文的第一作者,西北大学的大卫·米勒说,这项研究“表明女性在拿到STEM领域的博士后开始倾斜发展”。这是真的吗?怎样可以以男性比例下降来解释女性行为的变化?

除了带有质疑地庆祝了一下男性持久性的下降率,这项新的研究文章可以说是只完成了一半的工作。特别是,它遗漏了博士生进入何种科研机构这一重要问题。

关于年轻的、进入学术界的研究人员,我们知道,少数一流大学负责培训了未来的几乎所有研究型教师。但是,女性和男性进入的大学是一样的吗?或者是,女性去了更低声望的机构工作?我们不知道。研究方法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博士生能够给我们提供更多有关性别、个人工作科研机构的信息,我们就可以对男性、女性的不同职业发展进行考察,从而发现这种性别差异可能会给他们的职业生涯带来何种影响。男性和女性可能在某些节点遇不到这种发展的“泄露”和倾斜,但就是整体而言,他们最终的发展还是不一样。

这项新研究描绘了随着时间推移的视图,

它展现的是持久率几乎没有变化的女性和持久率下降的男性。它还展示了早期干预的价值:作为女性获得学士学位的人数增加,因此获得博士学位的女性数量也有所增加。因此,作者主张,我们应该更早地开始招聘女性进入科学界。

不过,研究者们仍然遗留了一些重要问题没有回答:为什么与几年前相比,更少的男性没有博士学位?为什么女性仍然没有完成?有博士学位对女性来说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没有吸引力的点?我们如何能密封这种发展管道,而不是坐视其继续“泄露”和倾斜?这些都是大问题,需要我们现在立即加以关注。

(作者系挪威特罗姆瑟大学教授,本报记者韩琨编译)



图片来源:www.quanjing.com

高教观点

教育腐败亟待“面上”清除

中华教育改进社

从2014年6月3日,教育部党组印发《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的实施意见》,不久后约谈部分司局负责人并签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承诺书》;到12月,制定《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的实施意见》,明确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依据中纪委网站和媒体公开的信息,2014年至少有17个省市区39位高校领导被查处,共性问题集中于受贿,少数涉嫌通奸、性侵犯。

在全国反腐倡廉环境下,教育系统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总体上仍处于“雨打地皮湿”的状态,其效果与民众期待存在较大差距,诸多公众可以切身感受到的教育腐败现象依然如故。现有教育腐败治理的基本特征是:抓了若干个案,未能实现面上的清除,至今还没有官员因为滥用职权违规为子女批条子、打招呼谋取入学特权而被揭露出来,而这才是教育领域普遍存在且危害巨大的腐败,它公然挑战教育公平价值观,造成了阶层固化。

从整体上看,尚未真正建立起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权力运行仍未充分公开透明;被揭露出来的仅仅是教育腐败的冰山一角,明显存在揭小藏大、利用公权暗中保护现象,更多、更大、更严重的腐败问题仍然被权力掩盖;在腐败的重点领域——科研经费、考试招生、学术评定、后勤服务、乱收费、基建和各种重大项目等方面缺乏专业的评估和监督,仍然是行政领导在缺乏专业依据基础上作决策;一些腐败行为在变换方式继续发展。教育系统的腐败亟待下决心斩草除根,解决行政管理权力过度集中、监督机制不完善、教育单位内部民主制度不健全,师生的基本权利缺乏正常表达和维护渠道等问题。

教育腐败的根源是社会腐败。教育腐败较其他行业具有隐蔽性、群体性的特点,消除教育腐败的治本之策是加快依法治校和依法行政。其关键在于:一是简政放权,列出教育行政权力清单,减少行政机构对教育微观的专业事务过度干预,加速建立对行政权力的监督机制;二是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深化细化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分离,将学术权交由真正通过规范专业程序组建的学术委员会,完善学校内部民主治校体系;三是改变行政权力不受监督的现状,使教育系统内部权力运行更加公开透明,尤其要把行政权力干预各级各类学校招生和学术评价的闸门,不存在不受监督的权力运行,对教育的投入、资源配置过程公开化,建立当事人参与机制,形成公众看得见的教育公平。

教育腐败的核心在选人、用人和财政经费的使用,亟须建立透明财政预算和执行机制,施行行政与学术角色严格分离,加快依法治校,建立现代学校制度,从根本上去除过度行政化、规范校长的遴选、任命和履职监督,将学术权交由真正通过规范专业程序组建的学术委员会,实现学校信息的透明化,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学生自治,改变行政权力裹挟学术不受监督的现状。

(节选自《2014年度中国教育改进报告》,有删改)

教师准入门槛究竟该如何界定?如何保证教师的师德水平?是否应该建立教师退出机制?这些问题是目前社会舆论非常关心的。改革教师资格考试制度有利于全面审查申请入职者的综合素质,也有利于我们国家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

按照目前大部分省市的教师招聘办法,师范类院校毕业生无须进行考核,无论成绩如何,无论适不适合教育事业,都能走上讲台。由于就业压力大,部分毕业生对未来的职业规划并不明晰,一部分不适合做教师的毕业生就进入了教师行列。

对于教师行业的准入机制,有必要变“宽进严出”为“严进宽出”。通过对教师资格考试进行改革,或许能改变目前的现状。通过考核,让有能力,对教师行业有兴趣、热情的毕业生进入教师队伍,这能为教师行业的发展划出一条底线。

在笔者看来,通过考核职业认知、心理素质、仪表仪态、言语表达、思维品质等教师基本素养和教学设计、教学实施、教学评价等教学基本技能,基本上可以判定报考人员是否适合做教师。

同时,教师进入工作岗位之后,学校和相关的教育行政部门要创设教师成长平台,让教师在工作中有成就感。这样,教师对工作的认可度也会相应提升。目前社会上一些被曝光的师德方面出现问题的教师很多是由于工作压力大或心理方面出现障碍。所以,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要善于观察教师的状态,及时为教师排忧解难;对一些专业能力有所欠缺的教师,要及时给予帮助。

在进行教师准入机制建设和在职提升的同时,还应建立教师的退出机制,让不适合从事教师这个行业的人退出,这样可避免一些教育悲剧的产生。教师的退出机制不仅要考虑教师的能力水平,更要考虑教师的师德水平。能力水平可以通过教育教学成果看出,而师德水平的体现则要综合同事、学生、家长等多方面的意见。

2015年,全国范围将实施师范生参加教师资格证考试和教师资格5年一注册等措施,这或许会打破教师一证终身制的传统模式。当然,这个政策还要进行细化,既要成为教师发展的动力,也要让它成为教师规范自己行为的准则。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

教师准入:「宽进严出」变「严进宽出」

卢立涛